

非典时期“看一眼”



朱明德 主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序言：防治非典也要依靠社会科学

防治非典一要依靠群众，二要依靠科学。依靠科学不仅依靠自然科学，也要依靠社会科学。这不仅是道理，而且是现实；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践。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近两个月的实际行动，就是很好的证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在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一手抓防非典，一手抓科研，而且是紧紧围绕抗击非典抓科研，取得了职工、家属“0”感染和非典科研成果 30 多篇的好成绩，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为全市抗击非典提供了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导。收入本书的就是这 30 多篇科研文章。

这些文章从社会科学角度，特别是从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角度，认真研究了防治非典工作，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当时，通过社科院内刊《看一眼》一篇一篇初读时，为之一振；现在汇集在一起读，仍然深受启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们，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反映之迅速、配合之紧密、成效之明显，令人鼓舞，令人敬佩。他们的实际行动充分说明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是非常正确的，充分说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两手抓”，做到“两依靠”、争取“双胜利”是非常正确的，充分说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多年坚持的“让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办院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充分说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多年工作的基础是好的，现任院领导班子在这场斗争中组织是得力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的支持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北京非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北京和全国抗击非典斗争正在走向胜利。然而,我们还决不能麻痹,决不能松懈。即使取得最后胜利,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进行科技攻关,找到根本预防和治疗的办法,自不待言。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新闻学、信息学、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系统地、全面的研究,甚至还要从交叉学科研究。从这个角度说,市社科院所做的工作还是初步的,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还只是初步的。这只是良好的开端,深入研究的路还很长。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科学对抗击非典及各项工作有重要作用,还要搞清楚有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我们不仅要看到非典对经济和社会直接的、简单的、负面的、有形的、当前的、当地的、可弥补的影响,更要看到、而且要深入研究间接的、复杂的、正面的、无形的、长远的、广泛的、不可弥补的影响。

非典发生是件坏事,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可是坏事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好事。需要我们全面总结、深刻反思、深入研究。希望也相信这本书仅仅是关于非典研究的良好开端。期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此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宋贵伦

2003年6月4日夜草

目 录

序言：防治非典也要依靠社会科学

抗击非典，我们要求上前沿

——院党组书记、院长朱明德给市委书记、市长的一封信	(1)
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看怎样战胜非典型肺炎	(2)
在对抗“非典”的战斗中应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灾难观	(5)
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经验教训	(7)
社会科学在防治“非典”流行病中可以有所作为	(11)
近代中国最早的防疫工作	(13)
如何应对疫灾	(17)
暂时允许商贩到菜市场以外的露天地方分散卖菜	(19)
社区党组织在预防和阻击“非典”中的作用	(21)
在防治“非典”中如何加速由社会恐慌转变为社会安定的紧急措施之建议	(24)
关于“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问题	(26)
为城镇垃圾处理立法用法律形式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28)
防治瘟疫的历史经验	(30)
预防次生灾难的两条建议	(33)
“非典”疫情期的几条紧急建议	(36)
关于抗击“非典”的建议	(38)
建议分区域恢复正常生活	(40)
“非典”时期北京市民心态调查报告	(42)

SARS肆虐时的经济学思考	(54)
“SARS”对北京经济的影响浅析	(57)
组织护工队伍,减轻医务人员压力	(63)
关于调整上班时间的建议	(65)
灾难恢复与社会经济振兴	(67)
“非典”给我们的启示	(71)
“非典”时期应慎重制定吸引外来人口回京的政策	(73)
遏制 SARS 负面影响促进北京经济健康发展	(76)
关于加强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管理的建议	(80)
抗击“非典”的“三不政策”建议	(82)
我院认真落实市委领导批示精神对疫情后的北京开展深层次研究	(84)
抗“非典” 思机遇 抓发展	
——密云县工业开发区调查报告	(86)
在 SARS 挑战面前对政府管理行为的几点思考	(91)
关于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及健全北京市“公共危机预警系统 和政府预案”的建议	(93)
北京餐饮业在后非典时期复业新模式的思考	(95)
“非典”时期——北京金融服务消费的变化及其影响	(100)
尽早建立社会预警系统和应急机制	(103)
恢复社会信心,重振首都经济	(108)
抗 SARS 与北京经济的八大变数	(111)
用法律将非典防治工作进行到底	(116)
心系大局 打造信心	(118)
非典对北京经济负面影响的机理分析及其对策思考	(122)
重振怀柔旅游	(128)
被“看一眼”感动(后记)	(132)

抗击非典,我们要求上前沿

——院党组书记、院长朱明德给市委书记、市长的一封信

刘淇书记

岐山市长:您们好!

防治“非典”的战斗,医学自然科学工作者责任大、任务重,他们的表现可歌可泣,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北京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对抗“非典”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比如疫灾可能引发的次灾害、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比如从人文角度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诸方面系统地关注减灾灭疫,比如预测疫灾影响、反馈社情民意(“疫病要防控,人心要聚拢”)、以及理性总结这场斗争,辩证地揭示这件大坏事将会给北京诸方面提升工作带来的机会等,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研究的,也是可以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服务的切入点。21日,我院党组已适时成立了“北京如何尽快战胜‘非典’”专项课题组,一些学者开始撰文或建议,为北京抗非典斗争给以理论支持,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我请求市委市政府允许我们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列席市防控非典的一些会议和调研活动,是我们的专家学者真切参加防治非典的斗争实践,以便了解系统情况,及时献计献策,并积累资料,为日后创新北京社会科学某些理论做准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请市委市政府随时调用这支理论队伍。我们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会努力出特殊的心力。我院愿以积极参加抗“非典”斗争的实际行动,真诚实践“三个代表”。

北京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朱明德

2003年4月23日

看 一 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报

第八期 (总第十六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2003年4月22日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 新 经 验 · 新 建 议

领
导
批
示

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看怎样战胜非典型肺炎

针对当前非典型肺炎流行对我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我院在朱明德院长的领导下,紧急成立了由我院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来研究如何战胜诸如“非典”之类的突发性自然灾害。4月21日课题组召开了预备会,部分专家学者就这一题目发表了自己的初步意见。现汇报如下:

当前非典型肺炎流行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恐慌,一些谣言的流传更加重了

社会的恐慌心理。从历史上看,发生大疫若处理不好会引起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为此,我院专家学者提出了以下应对措施:

一、政府在人民群众面前一定要保持镇定,给人民群众以战胜非典的信心

从社会学角度看,当大难来临的时候,人们都需要一种安全感和依附感。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急人民所急,要提供这种安全感和依附感。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各级政府官员在电视等重要媒体露面时一定要设计好自己的形象,一是要树立自信、镇定的形象,回答问题前要精心准备,要镇定自若,准确无误,尽量避免使用容易产生异义或模棱两可的语言。二是要塑造高效的形象,表明我们的政府在应对灾害面前是有效率的。三是要树立尊重科学的形象。通过上述措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党和政府一定能够领导人民战胜这场瘟疫的信心,克服当前的恐慌心理。

二、对疫情要及时公布,保持主流信息渠道的畅通

主流信息渠道代表党和政府的声音,如果主渠道不通,流言蜚语必然会滋生蔓延。一是要通过各种媒体及时向人民群众公布疫情,绝对不能缓报、瞒报。二是要把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分开,向人民群众免费赠送各种防治非典的宣传品和药品。三是要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让他们在各种媒体上介绍情况,进行宣传,增强主渠道信息的可信度。

三、把全社会发动起来,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

要把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在防治非典中的作用。建议像五十年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那样,对全市的卫生状况进行一次大清理、大整顿。通过运动,一可以改善我市的卫生状况,更主要的是可以消除群众的紧张、恐慌心理,这是被社会心理学所证明了的。

四、加强立法,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遗体自愿捐献原则,目前仅有很少几例病人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从医学的角度说,这对弄清病因是远远不够的。当大灾大难来临,人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遗体既是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在当前来不及立法的情况下,要特事特办,紧急出台有关遗体解剖的政策,解决遗体不够的问题。

五、要早作准备,防止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和自然灾害政治化

从历史上看,当瘟疫来临的时候,封建迷信往往会乘机兴风作浪,并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甚至引起政权的交替。当前我国社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未能完全化解,暗藏的法轮功顽固分子也有可能伺机行动。因此,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防范工作,一有苗头坚决制止,绝不手软,绝不能让非典激化我国的社会矛盾以至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六、“非典”防治机构中要吸收社会科学专家学者

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可以起到医学专家起不到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分支里,有一个社会流行病学,它对流行病的控制、防治的贡献是很大的。如:霍乱的病源就是由社会学家在水源里发现的,癌症与吸烟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学家通过多年的跟踪研究解决的。相对而言,医学家面对的是个体,社会学家面对的是群体,流行病不仅仅是病,它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在非典防治机构中吸收社会科学专家学者,通过医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尽快控制非典的流行。北京社科院请缨参加我市防治非典研究的战斗,愿从特别角度做出应有贡献。

以上只是我们初步的研究成果,后续将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上报。

北京市社科院办公室 殷星辰 唐 鑫 整理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人大主任,市长、副市长,市政协主席。

宣传部部长、副部长。

宣传部研究室。

送:各位院长、科研处、办公室。

看 一 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报

第九期 (总第十七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2003 年 4 月 24 日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 新 经 验 · 新 建 议

领
导
批
示

在对抗“非典”的战斗中应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灾难观

目前,首都人民对抗“非典”的战斗,已经进入高潮。这是一场人类同自然灾害的艰巨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层面的,更是社会科学层面的。不仅仅需要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角度,揭示“非典”病毒肆虐的根源,找到战胜“非典”病毒的药物;更需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树立正确的灾难观,建立科学的抗灾机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目前,北京市发现“非典”病例虽不足千人,死亡人数虽不足 20 人,但是,其社会负面影响之大,

难以估量。这就主要是一个社会科学层面的问题。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灾难观,正确对待“非典”这场自然灾害,树立信心,从容应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典”和其它自然灾害一样,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它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且是可以战胜的。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提高战胜自然灾害能力的历史。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大禹治水,就是我们的先民同洪水灾难的斗争。对于“瘟疫”,例如霍乱、鼠疫、天花等,我们人类已经取得了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些可怕的疾病,在我国已经基本绝迹。“非典”作为一种新的传染病,我们在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战胜它。面对自然界,包括自然灾害,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我们在对抗“非典”的战斗中,要宣传这种思想,从中树立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任何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惊慌失措的行为,都是不正确的,不可取的。

荀子在《天论》中指出:“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自然灾害不足为怪。在自然灾害面前,“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他认为,在自然灾害面前,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公平。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对抗“非典”战斗的胜利的。

建议:

一、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灾难观,宣传人定胜天的思想。

二、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消除恐惧心理。

三、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在新闻媒体面前,要保持镇定、从容的公众形象,要表现出必胜的信心。

四、对党员进行唯物主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灾难观教育,要求党员正确对待自然灾害,不得惊慌失措。

北京市社科院科社所所长 李贺林研究员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市长、副市长、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

宣传部部长、副部长。

宣传部研究室。

送:各位院长、科研处、办公室。

看 一 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报

第十期 (总第十八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2003年4月25日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 新 经 验 · 新 建 议

领
导
批
示

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经验教训

目前,“非典”这个新瘟神潜入北京,四处流窜,搅得政府揪心,百姓不宁。大敌当前,全民共御之。

回眸历史,曾有各种名号的“瘟神”如天花、鼠疫、霍乱、猩红热、大头瘟等,出现在北京,伤人害命。封建朝廷亦努力采取防治与救济措施。例如: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为准备迁都而扩建燕京城,营造新宫殿,征调一二十万工匠民夫供役。在督工强制下,民工劳动强度很大,又暑月天热,导致

瘟疫爆发，“工役多疾疫”。海陵王“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金史·张浩传》）

元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都）大疫”。（《元史·仁宗纪》）至正十四年（1354年），“京师大饥，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元史·顺帝纪》）至正十八年（1358年），“京师大饥疫”。因为这时河北、河南、山东境内，烽火连连，兵荒马乱，大批民众为避战乱，扶老携幼，涌向京城。这是造成京师大饥疫的主要原因。当时大都城内外“死者相枕藉”。宦官朴不花“欲要誉一时”，便筹错资金，“市地收瘞之”，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择地掘大坑深圪，分别男女埋葬。“至二十年（13邱年）四月，前后瘞者二十万。”（《元史·朴不花传》）。仅至正十八年皇后奇氏便“出金银粟帛命资正院使朴不花于京都十一门置家，葬死者遗骸十余万。”（《元史·后纪传一》）有人认为，元顺帝旨正十八、十九年，大都城饿死、病死的人近百万，在大都十一个门外，各掘万人坑掩埋。（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北京史》增订本）

明成化六年（1470年），北京地区遭遇特大旱灾。次年发生饥荒，“饥民行乞于道，多有疲不能文或相朴藉。”七年（1471年）五月，“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与路。……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成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瘞遗尸。”（《明实录宪宗成化实录》）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死亡塞道”。朝廷“令太医院发药，户部与锦衣卫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死者，官给席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皇帝渝阁臣“连岁雨泽衍期，近复风疆蔽日，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者甚众。”“人死至亲不敢吊问。”（《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时亢阳，雨泽鲜少”，“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一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给散，不许兵番人等做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五月三十日，太医院奏报“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抱病就医，问病给药，日计千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五城共医过男妇孟景云等十万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用过药料一万四千六百六十八斤八两。”又五城地方给散银钱，“共散过患病男妇李爱等一万六百九十九名口，共用银六百四十一两九钱四分，钱十万六千九百九十文。”（同上书）至明末崇祯十四、十五、十六年（1641—1643年），北京连续发生大疫，史称“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特别是崇祯十六年，自二月至七月间，“死亡日以万计”，“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当时疫情之严重，可想而知。

清朝有国二百六十七年，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十五个年份北京城内外发生瘟疫。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贺”。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十七年（1660年）五月，“亢旱疠疫，灾眚迭见”。（以上见《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康熙十九年（1680

年)，“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康熙《通州志》)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嘉庆七年(1802年)，“延庆大疫”。(乾隆《延庆州志》)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清宣宗成皇帝实录》)这年瘟疫是霍乱，直至八月，死者不可胜计，以致恩科乡试改期进行。朝廷命发文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材、棺材之用。同时，平谷、通州也发生严重瘟疫。四年(1824年)，“平谷大疫”，“自春徂夏，瘟疫大行。又兼三年(1823年)秋禾不登，人多无食，死者不可胜计。甚有全家病没无人埋葬者。有因年荒无资棺敛而藁葬者。”(《平谷县志》)十三年(1833年)，“昌平州大饥疫，路死者相枕藉。”(《光绪昌平州志》)又“延庆州春饥，瘟疫流行。”(《延庆州志》)同治元年(1862年)、二年、六年(1867年)京城或延庆、通州都曾发生过瘟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因顺直频年水灾，流民现汇率来京，北京又疾疫流行，“城下路旁男妇老幼枕藉露处，道瑾相望。”(《清德宗景皇帝实录》)清代对于瘟疫的预防措施有力。有人记载，“王师如燕之始，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离，弱多道瑾。后从御史赵开心言，出痘之家，须痘已见，放出城。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其聚处。有抛弃男女者，该管官严加责治。今岁月久，不复以痘为虞，旧制全革。惟蒙古王公出痘者，免来朝京师，所以示体恤也。”(吴振核《养吉斋从录》卷25)

根据上述史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历史上北京地区多次爆发瘟疫，有的还相当严重，甚于今天的“非典”。因此，“非典”既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绝不可轻视，但亦不必恐慌。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治疗和预防。任何困难、危机和敌人，都是能够战胜的。对于战胜“非典”必须坚定信心。

(2)历史上北京地区瘟疫的暴发，多与大灾、饥荒及流民有关。北京地区近年干旱严重，且外来人口日多，人口流动量大，故发生各种传染病的机率增加。对此，北京市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时刻保持警惕。并教育北京市民，牢牢树立防灾防疫意识。

(3)历史上北京防治瘟疫的措施，无非是朝廷诏命并组织精医治疗病者。官府给药、给粮、给钱，以缓贫民之困。对于死者，官府给钱给棺，挖坑深埋，并出地作为公共墓地。为防传染，也采取隔离、回避措施。这一切现在都可办到。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为防痘疹，将病者“移之四十里外”，于北京城“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其聚处”。在那时采取这样的隔离措施，无疑是坚决而有力的。这样，既有利于及时掌握疫情，有利于总结获取治疗经验，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更有利于隔离传染源，防止更广泛的传染。

(4)瘟疫和其他自然灾害一样，都是物质运动的异常形式，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敌。历史上北京地区发生过的洪水、干旱、地震、狂风、冰雹、

沙尘暴、泥石流、蝗虫、瘟疫的各种自然灾害很多,比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体验到的,要严重得多。因此,今后北京市的防灾减灾,必须立足于防特大灾、备特大灾、抗特大灾、救特大灾。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必须时时绷紧这根弦,切不可掉以轻心。

(5)这次“非典”危机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是,对于防灾救灾,物质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精神力量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精神力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准备,即防灾救灾意识的加强。二是广大干部群众同各种灾害作斗争的能力,包括勇气和有关灾害知识。三是政府各部门组织防灾救灾机制的高效率运转。没有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今后北京市的防灾救灾只能是被动的低效的穷于应付。而加强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重要的是经常进行宣传,增强市民的防灾防疫意识;坚持科普教育,丰富市民有关各种自然灾害和防救措施的知识;落实组织机构,制定规章法令,明确职能责任,提高领导和指挥防灾救灾的能力。只有充分的物质准备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相结合,才能尽快战胜任何严重的突发的各种灾害。

此外,应在全市发动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持之以恒。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尹钧科 于德源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人大主任,市长、副市长,市政协主席。

宣传部部长、副部长。

宣传部研究室。

送:各位院长、科研处、办公室。

看 一 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报

第 十 一 期 (总第 十 九 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2003 年 4 月 25 日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 新 经 验 · 新 建 议

领
导
批
示

社会科学在防治“非典”流行病中可以有所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病在我国的发作不是第一次。近年,对甲肝、红眼病、流感等流行病人们还记忆犹新。对于非典型肺炎这种新型流行病,我们确实需要高度重视。

4月18日《北京日报》载:本市举办“非典”流调培训,由10名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作指导。不知道专家组中是否有社会科学专家,特别是社会学专家?如果没有,建议增加。须知社会学者在流

行病的防治研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举两个例子：

例1：英国波西瓦尔·波特爵士于1775年对引起阴囊癌的未知物质进行大量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清扫家庭取暖产生的煤灰的职业工人，容易引起敏感肌体，由是建议清扫工人每天清洗身体，从而在致病物质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成功地断断了病因链，有效地减少了患病者。

例2：英国约翰·斯诺爵士于1854年通过研究霍乱病死者的日常生活情况，寻找到他们的共同行为模式，发现了霍乱与饮用不洁水的关系。由于及时切断了二者的联系，有效制止了霍乱的流行。

另外，在吸烟与肺癌、健康习惯与死亡率等的医学研究中，社会流行病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管社会流行病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医学还是社会科学，他所依据的理念和采用的方法都是源于社会科学的。由此形成了社会学分支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流行病学这一重要交叉学科，这也揭示了社会科学在流行病防治研究中的作用。

社会学者在防治“非典”流行中可以做些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自然的生物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对于流行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疾病的流行往往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因此我认为，社会学者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开展社会调查，研究“非典”患者、“非典”病人亲密接触者以及周围人群的共同社会特征。

具体来说，首先可以通过对“非典”疾病由发生到流行的观察和考察，研究“非典”病源依赖的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心理学的特点；其次可以调查研究“非典”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征；第三可以对“非典”患者、“非典”病人亲密接触者以及周围人群进行社会和行为特征的调查，从他们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民族、职业（可以包括就业情况、工作满意度、劳动强度、职业遗症、心理压力等）、阶层、居住环境、身体状况（可以包括体质情况、疾病史、锻炼情况等）、经济状况（可以包括收入、收入满意度等）、生活习惯（可以包括饮食习惯、各种嗜好、作息习惯、近群习惯等）各方面寻找他们接触病源的几率和共同社会特征。

总之，社会科学的介入可以确定“非典”流行病患者所具有的共同社会特征，帮助医学家集中他们的研究，找出未知的病因，为防治“非典”流行提供多层面的、更全面的科学依据。

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 王煜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市长、副市长、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

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宣传部研究室。

送：各位院长、科研处、办公室。
